

江 翔 著

我在非洲十七年

**见证历史：
共和国大使讲述**

终于挣脱数百年殖民枷锁的非洲，迎来了国家振兴、民族发展的的大好机遇。然而美苏争夺、政局动荡、经济落后、内部纷争、灾害严重等等，使非洲的发展道路十分艰难曲折。作者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触，展现了20世纪60—90年代亲历的非洲风云变幻，非洲人民的顽强奋斗精神，以及中非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历程。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上海辞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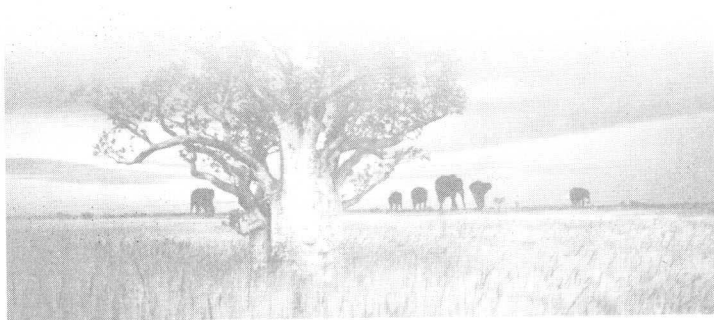
I25/407

2007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我在非洲十七年

江翔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非洲十七年/江翔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2

(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蒋本良,刘文祥主编)

ISBN 978 - 7 - 5326 - 2359 - 4

I. 我... II. 江...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非洲—现代史—史料 IV. I25 K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3072 号

出 版 人 张晓敏

责任编辑 王国勇 张晶晶

装帧设计 鲁继德 桑吉芳

本书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在非洲十七年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5 $\frac{4}{18}$ 字数 226 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359 - 4/K · 475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56628900 × 813



上图：1960年9月12日，毛泽东主席举行宴会，欢迎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塞古·杜尔。

下图：1964年9月29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刚果（布）总统阿方斯·马桑巴-代巴。



上图：1964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几内亚。图为周恩来总理在塞古·杜尔总统陪同下进入首都科纳克里市区。

右图：周恩来总理访问几内亚期间下榻在几内亚国宾馆“美景别墅”。图为周恩来总理、塞古·杜尔总统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





作者江翔与夫人吴清和在布基纳法索外交部为他们举行的欢送招待会上

序

在我 40 年的外交生涯中,17 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下简称非洲),8 年在欧洲,其余时间在外交部非洲司和西欧司工作。

非洲是我一生工作的主要阵地,而且最后我也是在非洲从外交岗位上退下来的。我曾三次去非洲工作(1961—1964 年,1969—1975 年,1986—1994 年),三次都逢非洲处于不同的历史转变时期。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到非洲,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和尚未独立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展开的时期,是非洲正充满希望的年代,也是我国外交首次走进非洲和在非洲艰苦开辟外交阵地的年代。我第二次在非洲工作,是在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期,这时正处于冷战高峰时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非洲和非洲动荡的年代。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逐步排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以及中国和非洲国家都面临着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我国同非洲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与合作,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在 70 年代进入了全面稳步的发展时期,我国为非洲国家援建的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如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

完成的。我第三次在非洲任职,是在冷战结束前后,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80年代非洲面临内外危机,是最困难的年代,而90年代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深刻变化,非洲局势异常动乱和非洲人民在动乱中重新觉醒的年代。

我亲眼看到了非洲在这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动荡和剧变。有些历史进程与重大事件,我是身临其境,是与非洲人民一起经历的。

我看到60年代初非洲人民以无比的激情迎接独立和对独立后的前途满怀希望的情景。在这个时期我同时也看到刚果(利)等非洲国家在争取独立的道路上所遭遇的艰难曲折。我经历了在赖亚力大使等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的领导下,我国在非洲开辟外交阵地的难忘岁月。我目睹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在中部非洲的激烈争夺。我在刚果(布)多次遇到惊险的军事政变,看到我国老一代外交家王雨田大使以他过人的智慧与外交艺术,在美苏激烈争夺所引发的动荡与混乱的环境下,在各种政治派别中广交朋友,使我国在政局动荡多变的刚果(布)稳稳站住脚,保持住了刚果(布)这块我国那时在中部非洲唯一的外交阵地。

80年代后半期,西方国家开始迅速发展高科技工业,非洲赖以生存的作为世界原料市场的地位下降,非洲在经济上进入独立后最困难的时期。在政治上,世界社会主义正处低潮与变革时期,苏联走向衰落,中国在进行改革开放;此外,国际政治格局正在深刻转变,非洲在政治上有很深重的失落感。我以无比同情的心情目睹了那时仍向社会主义方向寻求出路的布基纳法索的艰难与无奈。我在那里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军事政变。

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我在几内亚期间是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我目睹了非洲在这期间所经受的冲击和动乱;经历了非洲多党民主运动的全过程,看到了非洲在80年代末东欧政治形势剧变的冲击下,多党民主风潮在90年代初席卷非洲,不少非洲国家陷入激烈动乱,甚至内战与瘫痪。然而,最终我看到非洲人民在动乱所造成的苦难中重新觉醒,痛苦的经验教训使

非洲人民重新认识到非洲的当务之急与根本任务是稳定与发展。在这场非洲多党民主运动中,我还从几内亚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看到了非洲刚毅独立的个性与传统。

人老易忆往事,退休以后我时常回忆起外交生涯中的那一幕幕,最令我难忘的是在非洲度过的这 17 年不平凡岁月。我重温了在非洲的经历与见闻,再次思考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初到非洲时,我对非洲充满好奇心,见到新鲜事爱写点观感。后来我在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任职期间,开始记一点工作日志。每当深夜,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和外交活动后,在静静的灯光下,将白天的重要见闻记录下来。退休后,由于我曾长期在非洲工作和生活,对非洲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仍经常不由自主地思考非洲问题,怀念我的非洲朋友,关心非洲的发展,注意阅读报刊上有关非洲的报道和评论。每到年底我还要对非洲的形势进行一番总结,也曾为一些报刊杂志撰写过有关非洲的文章。由此也就渐渐记录下非洲自独立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的时世变迁。

我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干部,谈不上写什么回忆录。我之所以记载下经历过的非洲一些重大历史变迁,主要是想表达我对非洲这片古老而又历经磨难的土地的关切与期盼,寄托我对非洲人民和我的非洲朋友们的怀念,了却我对非洲的不了情;如果同时也能为人们了解 20 世纪后半期的非洲和中国在这期间同非洲关系的发展提供一点旁证,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本书书稿完成后,承蒙著名非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前所长葛佶同志详细地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序	1
---------	---

独立之初的非洲——在马里	1
--------------------	---

“希望的十年” / 从中国到非洲的漫长旅途 / 独立之初的马里 /
和中国农业专家在马里农村 / 陪同新华社记者造访非洲未建交国家 /
团结紧张艰苦创业的使馆生活 / 接待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 /
民间艺人做客中国大使馆讲述马里历史 / 非洲国家独立道路上的重大挫折——刚果(利)事件 / 非洲走向联合与统一的历程 /

冷战时期的非洲——在刚果(布)	73
-----------------------	----

中国与刚果(布)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 冷战时期美苏在刚果河两岸的争夺 / 全面稳步发展的中非关系 / 向往社会主义的刚果(布) /
在刚果(布)经历军事政变 / 中刚关系由建交到高潮 / 新中国第一代杰出外交家王雨田大使 / 中国和扎伊尔复交与建交之争 / 随王雨田

大使赴赤道几内亚谈判建交 / 走进“小人国”的村落 /

危机中的非洲——在布基纳法索 129

20 世纪 80 年代处于危机中的非洲 / 布基纳法索的“八·四革命” /
在危机中奋斗的布基纳法索 / 在农村大树荫下递交国书 / 桑卡拉——非洲第三代革命领袖 / 经历孔波雷发动的军事政变 / 一场不寻常的外交活动 / 我所知道的卡扎菲劝和内幕 / 军人四兄弟政权的结束 / 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 / 中国援建的布基纳法索农业垦区 / 中国为布基纳法索医疗事业付出的沉重代价 / 瓦加杜古中餐馆 / 布基纳法索和中国外交关系的大起大落 / 告别瓦加杜古 /

动乱的非洲——在几内亚 199

带着困惑与忧心前往几内亚赴任 / 非洲陷入多党民主运动的动乱 / 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 利比里亚内战 / 几内亚由军政权向民选文官政权的过渡 / 中国和几内亚悠久稳固的友好关系 / 中国大使馆的义卖活动 / 对几内亚总统孔戴的印象 / 告别非洲 /

独立之初的非洲——在马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长期统治非洲大陆的欧洲殖民帝国力量削弱,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亚洲和北非的民族解放斗争迅猛发展;沉睡几百年的非洲大陆觉醒,非洲遇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利国际环境。

“希望的十年”

战后,亚非一些国家起来进行的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极大地削弱了英法两个殖民帝国的实力。特别是越南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法国这个殖民帝国。这给非洲,尤其是法属非洲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创造了有利形势。

战后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与亚洲出现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成为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强大后盾。尤其是新中国成为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非洲大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洲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作出了贡献,许多非洲人参加了法国等宗主国的军队,转战欧亚非战场,他们在与白人士兵并肩战斗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认识到非洲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展开。非洲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迅速走向独立,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的斗争目标。

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定的国际环境下比较顺利地取得了政治独立后,人们以为非洲在经济上也将会迅速走向独立和实现腾飞。非洲人民对自己未来的前途充满希望,他们希望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能迅速肃清殖民帝国的经济势力,掌握国家经济主权,实现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完全独立。非洲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充满自信,相信依靠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其他大陆的帮助,非洲经济能迅速发展,实现人民生活富裕的目标。

几个世界大国也都对独立后的非洲怀有企图。法国等西欧国家希望在独立后的非洲大陆继续最大限度地保持它们的殖民利益,使非洲在政治上永远属西欧的势力范围,经济上永远是西欧的原料基地。美国想趁欧洲在非洲殖民统治体系崩溃的时机打进非洲,使非洲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控制非洲丰富的战略资源和未来的市场。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不仅认为非洲的资源对美国未来的发展是重要的,而且还预言非洲大陆将会发展成世界的大市场。苏联希望独立后的非洲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使非洲发展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广阔阵地。苏联的学者还为非洲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认为非洲可以在自己传统的村社基础上,越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独立之初的非洲引世界瞩目,非洲自己和世界大国都从自己的视角对非洲寄以期望。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在回顾和总结非洲独立后30年的历程时,都称非洲独立后的最初十年,即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希望的十年”。

从中国到非洲的漫长旅途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标志亚非两大洲人民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会合。会议期间,我国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组织开始接触和建立联系。1959年我国同独立后仅一年的几内亚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外交首次登上非洲大陆,并很快在那里建立起了广阔的外交阵地。一年之后,我国又同新独立的马里建立了外交关系。马里是在1960年9月22日宣布独立的,同年10月27日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不到40天即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1960年底我被通知调往刚刚获得独立的马里工作。这一年的夏季我刚从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工作期满回国。1961年1月中旬,我作为我国赴马里第二批建馆人员奔赴非洲。这时的非洲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大道上胜利前进,已有17个国家在我到达非洲的前一年即1960年取得了独立,尚未独立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在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

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想像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从中国去非洲那漫长曲折的旅程。在那个时代,我国对外的大门在北面,须经苏联莫斯科通向世界其他地区。而那时的非洲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已取得了独立,但对外交通仍只能通过原宗主国的首都。像马里等原法属非洲的殖民地国家,对外交通联系都要经法国巴黎。而在1964年以前,我国同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无法经法国进入非洲。所以我们那时去马里是要经苏联的莫斯科、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和几内亚的科纳克里三个国家的首都,辗转半个多月才能到达。

我们一行6人,1月中旬从北京出发,乘坐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经整整一个星期的旅途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两天后再坐火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首

都布拉格。那时在苏联等东欧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有飞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班机。

我们在布拉格乘坐飞机向南飞行,越过地中海进入北非,随后就飞越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大沙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飞越撒哈拉沙漠。沙漠上空常有变幻不定的气流,遇上恶劣气候飞机就上下颠簸。那时捷克斯洛伐克飞机的性能、驾驶员应对撒哈拉沙漠上空气流的技术等,常使旅客感到不安。据说我们后面的一班飞机就从撒哈拉沙漠上空掉下来了。

飞机到达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第一站是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飞机在达喀尔机场停留一小时,过境旅客都下飞机到候机室休息。我一出机舱,一股热浪迎面袭来,立刻将我紧紧裹住,感到浑身难熬的炽热。那时是1月份,在北京、莫斯科、布拉格正是隆冬季节,我们从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一下进入非洲撒哈拉大沙漠边缘三十几度的酷暑。穿着厚厚的毛线衣毛线裤经受撒哈拉沙漠边缘的热浪,是我踏上非洲大陆接受的第一个洗礼。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那是1961年2月1日的下午,我第一次走进非洲,踏上这片被认为是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

在达喀尔机场,我第一次见到了黑皮肤的非洲人。机场海关人员和其他服务人员都是黑人。他们身材瘦高、皮肤黝黑,穿着红色制服,显得特别精神。他们对我们这些来自东方的黄皮肤亚洲人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航空公司为每位过境旅客提供一杯免费饮料,身着红色制服的服务员很有礼貌地为客人端送饮料。非洲人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觉得他们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飞机从达喀尔机场起飞后就沿着非洲西海岸的大西洋边继续向南飞行,大约又经过一个小时的旅程,就到达了这条航线的终点——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几内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那时我国驻几内亚使馆建馆已一年多了,是我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的大使馆。我们在科纳克里又停留等候去马里的飞机。

科纳克里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坐落在伸进大西洋的一个半岛上,市区到处绿树成荫,房屋多数是平房,少数楼房也只有两三层。这可能是由于非洲地广人稀,盖房子可以任意向平面延伸。

走出科纳克里市区就见到连片的香蕉林,棵棵树上挂满大串香蕉,每串香蕉有1米多长,有几十根香蕉。后来我才知道,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法国将几内亚发展成为它的香蕉生产基地、几内亚的邻国马里为水稻基地、塞内加尔为花生基地。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香蕉在大多数地区,尤其在北方是昂贵的高档水果,我从小到大也没有吃过几根香蕉,这回一下见到那么多的香蕉,真是如入梦境。那香蕉林看上去没有什么田间管理,好像是在荒野里天然生长起来的。我第一次看到了非洲大陆的富饶土地。

我们在科纳克里停留时正值我国在这里举办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我们自然不会放过前往参观的机会。当我们到达展览馆参观时已是傍晚时分,即将闭馆,但观众仍然川流不息,人们对各种机器的操作技术表演很感兴趣。我们在参观时还看到了一起几内亚人训斥西方记者的事。原因是当时展览会上有碾米机碾米展示,世代吃大米的几内亚人一直是靠石臼碾米的,现在看到机器在源源不断碾出雪白的大米,感到十分新奇,大家争相观看碾出来的白米,秩序显得有点乱,因此展览会主办者便向参观者每人赠送一小袋碾出的大米,使大家都能看到白米,还可以带回去作为参观中国展览会的纪念品。由于参观的人数众多,大家只得排队领取这赠送的每人一份的纪念品。这时有两名西方记者暗暗地拍摄了这一排队领米的场面。他们的这一行为被在旁的一名几内亚工作人员看见了,他立即上前阻止,并要求他们交出底片。这时周围的人都立刻围上去,大家以愤怒的目光盯着那两名西方记者。那时是几内亚独立初期,在法国的经济高压政策下几内亚经济十分困难,几内亚人怀疑西方记者想以此去污蔑几内亚人民穷得在排队领大米。在群众的愤怒训斥下,那两名西方记者只得老老实实交出胶卷,灰溜溜地离开展览大厅。这使我看到独立后的非洲人民对西方人的高

度警惕性。同时也看出他们的自尊心很强,非常看重民族的尊严,而且敢于在西方人面前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尊严。

我们在科纳克里住了三个晚上,于2月4日下午乘坐一架小型的苏制客机飞往马里首都巴马科。马里是几内亚的邻国,飞机起飞后向东穿越几内亚全境。尽管科纳克里至巴马科的飞行距离不长,但由于飞机起飞时误点,我们到达巴马科机场时已是傍晚了。

当我们走下飞机时就听到一种非常奇特的鼓乐声。原来在飞机舷梯不远处有一群马里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是前来欢迎与我们同机到达的苏联艺术团的。苏联艺术团是专程到马里进行访问演出的。马里的艺术家热情地击打坦姆-坦姆鼓(tam-tam),演奏悦耳的非洲木琴(balafon),一群年轻人随着节奏明快的鼓乐声奔放地跳着舞蹈。这时我也很兴奋,一踏上马里的国土,就能欣赏到富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的非洲音乐与舞蹈。看到那纵情狂舞的马里青年,我立刻感受到刚取得独立的非洲人民的无比欢乐与自信。

独立之初的马里

初到马里,我对非洲的自然环境、人民的生活状况、社会的风俗习惯等都有很强的好奇心。没过多久我就有了大致的了解。

巴马科依然是法国人的天堂

我们到达马里首都巴马科的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于是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上街去观光,看看这个我们将要在此工作和生活的非洲城市。

我对巴马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和我们路经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有明显的不同,没有科纳克里那么多的树木,显得很干旱,甚至有点荒凉。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几内亚是大西洋边的国家,而马里则是地处撒哈拉大沙漠边缘